

张之洞
劝学篇
评注

陈山榜

大连出版社

张之洞劝学篇评注

陈 山 榜

大 连 出 版 社

张之洞劝学篇评注
陈山榜

大连出版社出版（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经销
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字数：140 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印数：1—5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承本 责任校对：阿 成

ISBN7-80555-223-1/B·1

定价：2.90元

张之洞和他的《劝学篇》

(代前言)

一、张之洞其人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中年后别号壶公、香岩居士、无竞居士等，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死后追谥文襄，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1837年9月2日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张瑛，曾任安化、贵筑、威宁等县知县、古州同知、兴义知府、贵东兵备道等职，1856年卒。

张之洞四岁入塾，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岁中举，十九岁考取觉罗官学教习。1860年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1861年4月回南皮，后到任丘为人作家庭教师。1862年入河南毛昶熙幕府。同年12月，其族兄张之万署理河南巡抚，张之洞入署为草疏言事。1863年入都会试，中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1867年7月，充浙江乡试副考官。8月，简放湖北学政。1870年11月卸职回京，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1873年7月任四川乡试副考官。9月，简放四川学政。1876年12月卸任返京，充文渊阁校理。1879年3月，补授国子监司业，9

2689/17

月，补左春坊中允，10月，转司经局洗马。1880年6月转翰林院侍读，晋为右春坊右庶子。8月，充日讲起居注官，9月转左春坊左庶子。1881年3月，补翰林院侍讲学士，6月，充咸安宫总裁，7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1881年12月，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1884年5月，调署两广总督。1889年8月，调补湖广总督。1894年11月，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北调主持军务，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1896年2月回湖广本任。1901年，清廷设主持“新政”的督办政务处，张之洞遥为参预督办政务大臣，11月赏加太子少保衔。1902年7月，兼充督办商务大臣。10月，刘坤一死，张之洞再次署理两江总督，12月，魏光燾调补两江总督，张之洞重返湖广本任。

1907年6月，张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8月，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本任。9月，补授军机大臣，进京视事，奉旨管理学部事务。1908年7月，兼充督办铁路大臣，12月，赏加太子太保衔。1909年2月，任德宗实录修纂总裁官。10月4日病逝。享年73岁。

张之洞是一位瑕瑜互见的政治家。

早在步入仕途之前，张之洞就追随其父张瑛，在贵州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开始与人民刀兵相向，而把自己与清政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1862年他在河南毛昶熙幕府，又参与了镇压捻军起义的罪恶行动。步入仕途之后，他对清政府更加忠心耿耿，亦步亦趋，对人民犯下的罪就更大了，例如他在湖广任上镇压“自立军”，杀害唐才常等。而当他进入军机以后，对清政府就不仅是单纯地追随，而是开

始参与清政府的决策了。所以，晚清政府对民族对人民犯下的诸多罪行，如对外割地赔款，屈膝卖国，对国内人民残酷榨掠，血腥镇压，或是作为执行者，或是作为决策者，张之洞都难辞其咎。由此而论，说他是清政府的帮凶，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亦不为过。

然而，在晚清政府的官僚队伍中，张之洞又是较为开明者。他的一些政见及行为，有时甚至还带有一定的爱国性质和进步色彩。其政治思想及施政方略，与较彻底的改革派相比，显得保守、落后，但与死硬的顽固派相比，则又较为开明和进步。在政务活动中，他有许多重大业绩。虽然其贡献的主观动机主要是为了报答清政府的知遇之恩，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而做的，但客观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涉外方面，他有时也表现得差强人意，例如在迫使改订《中俄里瓦几亚条约》的过程中，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都表现出他具有较高的民族气节和较强的爱国精神。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之洞还很注意清廉自守。他涉足官场数十载，既作过京朝官，也任过封疆吏，既管过较为清贫的教育，也办过极其肥硕的实业，他所经办的财款，数额何止万千？但是，他既不贪污公款，也不收受贿赂，甚至将晚清官员获取额外收入的一些恶例也予以革除，这在腐败的晚清官场，实在难能可贵。当时京官的外放，大多是作为捞取外快的肥缺而争取的，而张之洞则只当作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而已。他卸却四川学政回京不久，适逢四十岁生日，因囊中羞涩，竟不得不典当王夫人的陪嫁以换些钱来置酒自贺。而

当慈禧太后知道他无甚私产，赐他五千两银子建造宅第时，他竟又用这五千两银子在故乡建造了一所“慈恩学堂”，并且因五千两不敷开支，他反将自己的俸银搭进去了一部分。这种操守，与当时社会上那些贪官污吏相比，其高下实有天渊之别。

张之洞又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实业家。

张之洞对于实业，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兴业实绩。他于十九世纪末所提出的一些经济观点和实业主张，诸如兴业以育人为先、农工商互为因果、商为主工为使、注重能源和交通、科技兴农、举办合资企业或让外国人承包企业以引进资金和技术等等，不仅在当时属于先进，而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一些人的愚昧无知，他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极难故而极少能贯彻实行，但是凡他督抚过的地方，他都为当地农工商各业的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而以在湖北较为突出。

在发展农业方面，他奖励百姓垦荒殖谷，并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的耕作技术，还创办农务学堂、蚕桑学堂等以培养人才和推广先进经验。

在发展商业方面，他筹设了商务局、商场局、劝业场，倡立了商会，并奏请在武昌设通商口岸，以发展对外贸易，有时还直接派员从事商务活动，以利对商业的管辖和指导。

在工交方面，张之洞成就最大。他曾涉足采矿、冶金、军工、轻纺、铁路等诸多领域，他所创办的山西桑棉局、铁绢局，广东的枪弹厂，湖北的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矿务局、炼铁厂、枪炮厂等局厂，在当时都很著名。

他开创的炼铁厂，现已发展成名扬中外的武汉钢铁公司，而他所倡建的京广铁路，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交通干线。

在财政金融方面，他曾在广东创办银元局和铸钱局，特别是广东银元局，开中国制银元之先河，对抵御西方银元的入侵，维护民族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

当然，张之洞办实业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清政府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它在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无可讳言，张之洞办实业，也出现过许多失误，这主要是：

（一）因不懂科学，在决策时曾做出过违反科学规律的决定，并因而招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在注重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没太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有时甚至还予以阻挠，致使民间的经济潜力发挥不够充分，影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速度。

（三）在他的官办企业中，衙门习气和官僚作风过于严重，遏制了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这些失误，由主客观多方面原因所致，有的是可以也是应该避免的，有的则是在初创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并且与其业绩相比，更是瑕不掩瑜。正是因为张之洞办实业成就比较显著，清政府曾任命他兼充督办商务大臣和兼充督办铁路大臣，甚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之洞还作为近代实业家的先驱而为毛泽东所称道。

张之洞还是一位由旧而新的教育家。

他曾两次充任乡试副考官，两放学政，在督抚地方期间，

仍重视教育，供职军机后，还奉旨管理学部事务。他虽不是终生只从事教育，但教育事业却伴随了他的一生。张之洞极其重视教育。他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把教育提到了与治国行政相表里的高度，认为教育是国家兴亡所寄，故而他抓教育，动真的，来实的，搞有用的，成就巨大且影响久远。

他早年主要是从事旧教育。他对旧教育的贡献，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地方科举，清除历史积弊，秉公甄拔人才；二是兴办了一些旧式书院，如湖北的经心书院，四川的尊经书院，山西的令德书院，广东的广雅书院等；三是为指导学生读书和科考，编写了《书目答问》和《轩语》等书。

自从开始筹办洋务以后，他深感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空疏乏用，于是就致力于发展新教育，以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新型人才。他的设想是工农兵学商无业无学，又无人不学。于是他主持兴办了一系列以学习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这在工交方面有湖北的自强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工艺学堂等，在农业方面有湖北农务学堂、江西高安蚕桑学堂等，在军事方面有广东水陆师学堂、黄埔水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等，在商业方面，兴办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师范方面有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支郡师范学堂、湖北师范传习所等，另外还办有湖北女学堂、湖南育婴学堂、湖北敬节学堂以及一些普通学堂。除在本国内开办学堂之外，他还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派官员出国考察，并在日本

办起了湖北驻东铁路学堂。黄兴、宋教仁、董必武等，都曾就学于他主办的书院、学堂。

张之洞在近代学制由旧而新的嬗变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十九世纪末，为提高西学（即新学）的地位，以利于西学的推广和普及，他曾倡议变革科举，要求将原来作为科考内容的八比、诗赋等不急之务去掉，代之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即所谓西艺和西政，并且作为淘汰制的一关而放在五经四书的前边。二十世纪初，他又与袁世凯一起，奏请递减科举，要求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并将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1901年7月，为管理新式学堂，他在湖北创设了全国第一个属于省府的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湖北省学务处。1903年，他与张百熙、荣庆一起，拟订了全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新学制——“癸卯学制”（又称“奏定学堂章程”）。这个学制，是我国教育由旧而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可惜，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和他本人思想的局限，张之洞的转变，最终也没能彻底。他不仅在其主撰的《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中继续强调尊孔读经，并且还于晚年倡建了一所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湖北存古学堂，并且还曾让全国各省一律仿照办理。现在看来，这些迂腐守旧思想和行为，使其教育家的光彩有所减色。

张之洞也是一位言行兼备的军事家。

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张之洞发表了诸多军事言论，提出过许多军事主张，其中如重兵尚武反对弭兵等，都是比较有借鉴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而他之试图把中国传统的

军事理论与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相结合，以新体制新方法新装备编练新式军队的设想，虽有牵强之嫌，却多独到之处。至于他在抗俄、抗法、抗日等方面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其积极意义就更明显了。

张之洞不仅有大量的军事言论，而且有许多极为重要的军事实践。他的军事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编练新式武装。张之洞在抚晋时就曾试图编练一支“首重火器”的“练军”，几经请示，后虽获清廷批准，但由于他随即调督两广，山西练军未能组成。在两广任上，他编练了广胜军和广安水军，在湖广任上，他编练了湖北新军，即使在暂署两江期间，他还组建了一支自强军。其中湖北新军后来发展到一万多人，成为仅次于北洋六镇的第二支强大新军，并多次在全国军事比赛中名列前茅，享有一定声誉。

（二） 创建军事学堂。张之洞特别注重军事教育，而尤其重视对军官的培养，所以他在广东、江宁、湖北等地，创办了许多军事学堂，专门培养军事人才。他在湖北创办的陆军特别小学堂，训育学生达数千名，留有“六千君子共学堂”之称誉。辛亥首义人员中，有许多人曾在这个学堂受过培训。

（三） 兴办军事工业。张之洞在督广时，创建了一个枪弹厂，并已着手筹建枪炮厂，因调督湖广，未果。调湖广后，他在湖北办起了枪炮厂，并逐步将该枪炮厂扩建为枪炮弹药都能生产的综合性兵工厂，使之成为全国最近代化的军工企业之一。该厂造出的枪械，还是较受欢迎的。

（四） 亲自指挥战争。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由晋抚调督两广，亲自参与指挥抗法斗争。他东、西并筹，水、陆兼顾，大胆起用老将冯子材，优容刘永福义军，几经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这场中法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间唯一的一次打败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以胜利作为结束的对外战争。抗法斗争的胜利，不仅使我国西南边境暂时得以粗安，而且还逼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垮了台。

张之洞死后，清廷给他谥号文襄，也是对他武功的充分肯定。但是，必须指出，张之洞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军事家，而决非人民的军事家。为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他曾犯下镇压人民起义、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这是永远不能宽恕的。

张之洞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都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事业，同时，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思想理论界也有很大影响。他的足迹，不仅留在了翰苑和朝堂、边塞和兵船、书院和学堂、工厂和铁路，同时还留在了长达二百多卷的《张文襄公全集》里。张之洞的思想，既体现在他的事业上，也涵容在他的著述中。张之洞在思想理论方面提出的著名命题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命题，较为集中地代表了他的思想方法和理论纲领。而最全面最完整最充分地阐述他“中体西用”思想的著作，那就非他的《劝学篇》莫属了。

二、《劝学篇》其书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它集中地体现了张之洞

的思想方法，完整地表述了张之洞的理论纲领和施政要略，既是张之洞前几十年事业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后十多年事业的规划和蓝图。

《劝学篇》是变法维新声浪中的产儿。

1840年，英舰的大炮，轰开了清政府已关闭多年的大门，而太平天国的烈火，则差一点儿烧塌清政府的殿堂。拥进来的外寇和造反的奴隶，警醒了清政府的一些较开明的官员，他们再也不肯蹈故袭常抱残守缺地度日了，而是着手设洋务局，买洋机器，开矿山，建工厂，办学堂，练新兵，一时间轰轰烈烈，煞有介事。史家称之为洋务运动，甚至有冠以“中兴”美名的。然而时至甲午，洋务派的陆军败溃，海军覆没，四百兆人口的“天朝”，竟然惨败于一个东瀛岛国，并且向人家屈辱求和，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于是国人瞠目，舆论哗然，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也开始销声敛迹。

这场惨败，象一泼冷水，又浇醒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冷静地思考：为什么多年来与中国遭际基本相似的日本，突然间勃发如此呢？于是他们就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迹。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两国都曾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为抵御西方资产阶级的觊觎，两国也都曾发布过锁国令，执行闭关自守政策。十九世纪中期，两国的关锁都被西方资产阶级所斩断，抵御失败，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两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都曾铤而走险，以武装相抗争，可惜都惨遭镇压。两国一些较开明的官僚和士绅，也都搞过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终究也未能回天。上述种种，中日两国无一不大体相同。而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比中国多了一个“明治维新”。所谓“明治维新”，实质就是日本国发生在明治年间的资本主义革命。维新派先通过“王政复古”、“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斗争，推翻了幕府和各藩领主的宗法统治，然后通过“废除封建特权，实现四民平等”、“承认土地私有，实行地税改革”、“取消对农工商的种种限制，鼓励殖产兴业”、“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习俗”等措施，荡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使日本的社会生产力得以蓬勃发展，国民精神也为之振奋，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就由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一跃而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分析和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学日本，搞变法维新。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救治中国的药方，于是就起学会，办报纸，上书请愿，宣传维新，要求清政府变法。从1895年起始，到1898年春，这一运动达到了高潮。光绪皇帝原则同意变法，并将几名维新派人物安排到中央政府，筹谋变法。国家究竟应当向何处去？一时间，政界学界商界财界等各派要人，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主张变法，认为变则强，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急变则强，缓变仍亡，实际就是要求尽快确立资本主义体制。或者反对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

一变就会文明扫地，天下大乱。这派人的目的也很明显，那就是极力维护现存的封建体制。新旧两派，互相驳难，各不相让。当然其中又杂有帝后两党的派系之争，但那不是这里所要论述的内容，故不具体涉及。

张之洞既反对墨守成规的顽固派，也反对激进彻底的改革派。他认为，顽固派因循守旧反对变革，是因噎废食，难以应敌制变，而改革派提倡自由民主、搞民权、废三纲，是歧路亡羊，会导致天下大乱。他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变法不变道，即孔教的纲常伦纪和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不能变，舍此之外，不仅器械可变，法制也可变，而且为达富强之目的，这些都必须变。从思想方法看，这是典型的折衷主义和中庸之道，从历史渊源看，这是原洋务派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而其目的则在于通过变法变器以发展生产，进而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为阐述这套思想理论和施政纲领，张之洞于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的4月，在一片争论声中，著作出版了这部《劝学篇》。

《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内篇》由九篇各自独立的文章构成，其主旨是教育人们要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忠于清朝统治者，用张之洞自己的话说，就是“务本以正人心”。《外篇》由十五篇文章构成，其主旨在于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即所谓西政和西艺，并在不妨害三纲四维的前提下，仿照西方的先进体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都认真加以改造，变法维新，以达富国强兵、挽救危亡之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务通以开风气”。书前另有一

篇自序，意在交待《劝学篇》的撰写宗旨、写作背景和主题思想，并简明扼要地提示了书中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主旨。整部《劝学篇》，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宗教、新闻等诸多学科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所以，它是一部涉及面广而思想丰富的学术著作。

这部著作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认为，这部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便以圣谕的形式，下令军机处，让转发此书，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并要求各地广为刊布。因此，《劝学篇》很快刊行全国，据估计，总刊印量不下二百万册。不久又被译成英、法两种文字，分别在美、欧出版。纽约出版此书时，竟将其更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但是，由于《劝学篇》顽固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攻击民主民权和自由平等，所以同时也受到维新人士的尖锐批评。胡礼垣说它“不特无益于时，然大累于世。”梁启超竟诅咒它将化为灰尘而不齿于人类。就连一些较为推崇此书的外国学者，也看出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这一主张的错误，一针见血地指出，“孔教救不了中国”。

的确，孔教救不了中国，“变法不变道”也救不了清王朝。因为“变法不变道”这一命题，表面看来好象可行，实际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实践看，它也是无济于事的。在道与法这一对范畴中，道是法的灵魂，法是道的表现，它们之间是一变俱变的对应关系。所以，所谓不变道的变法，决不是真正的变法，而法制一旦真正变革了，那么，

与新法相对应的道，也就必然不是原来的道了。张之洞搞什么变法不变道，不过是掩耳盗铃、欺世罔民而已。老洋务派不变道，苦心经营几十年，刚遇上日本这样一个原来的难弟，便碰得头破血出，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的张之洞，也只不过是打着这面破旗，把清政府送进了坟场而已。

然而，《劝学篇》的价值又是不能因此而一笔抹杀的。在本书中，张之洞以其丰富阅历和博学多识，参照西学，针对国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宗教等许多领域，都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思想观点或行之有效的方略措施。这些思想观点和方略措施，在当时属于先进，有些至今尚未过时，有的甚至现今的实践也还未能完全达到其高度。即如对于中学，张之洞的见解也远较腐儒为优。当时的清政府，虽然转发了这部著作，但由于政治过于腐败，没能贯彻实行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和方略措施，若果能贯彻实行之，它或许还会多苟延几天。

《劝学篇》对变法的首肯，决定了其思想较顽固派为进步，那些新思想新观点新方略新措施，是其光辉所在，而不准变道的保守，又使它大为减色。它就是这样一部瑕瑜互见、得失相参的著作。所可喜者，其瑜其瑕，其得其失，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提倡改革开放的今天，其借鉴价值就更大了。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劝学篇》也是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著作。故中国近代史以及有关近代的哲学史、经济史、教育史等，都要提到张之洞，而只要提